

新国家中的旧边疆：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的层累边疆性与边境诸事件探析

李如东

摘要：1991年以来，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地区诸多冲突事件与该地带在中亚地区的社会—地理历史结构的位置移动、空间压缩和时间性堆叠颇多关系。层累的边疆性不仅可以作为解释当代中亚国家建构进程中边界与族群冲突问题的深层结构，而且也是亚欧大陆地区国家转型中的一般现象。对此种边疆性的考察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研究学术议题的整合，以及对不同类型区域社会体系展开比较研究。

关键词：中亚；事件；层累边疆性；奥什地区；国家建构

中图分类号：K36、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3）05—0108—08

一、问题与概念说明

中国的边疆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积极发展的面貌。一方面，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领域不断推陈出新^①，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史也被相关研究者从不同路径（尤其是具有社会思想史取向的学术史方向）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②另一方面，在部分学者和学术期刊的推动下，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为关切，旨在思考中国边疆民族社会与“大一统中国”之历史关系的“边疆中国”议题则聚拢了不少来自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学科的学人共同讨论^③，并衍生出边疆研究的“走廊视角”和“边疆思想史”等议题。^④与此同时，从2020年开始，《云南社会科学》杂志则围绕“边疆治理现代化”这一议题组织专栏文章^⑤，积极推动相关研究发展。不难看出，在诸多学术主体的努力下，中国学界的边疆研究在过去几年的确取得了进展，并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与边疆民族研究在问题意识上的合流。但如果稍加留意，则也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主要将中国的边疆作为其研究对象，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侨联课题“吉尔吉斯斯坦华侨华人现状调查与研究”（项目号：19BZQK2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如东，男，民族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亚民族问题、历史人类学研究。

① 参见姚大力：《边疆史地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② 参见马大正主编：《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段金生：《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汪洪亮：《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③ 王鹏辉：《再观“边疆中国”：近年国内边疆研究的前沿述评》，《学术月刊》2017年第12期。

④ 纳日碧力戈、施展等：《边疆与中心的交互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走廊视角（笔谈）》，《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袁剑：《从一般思想史到边疆思想史——一种人文—地理的关系学论纲》，《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

⑤ 详见《云南社会科学》2020—2023年“边疆治理现代化”专栏各期文章。

且多数著述侧重考察中国边疆沿革及其治理的古今演变。

凡此种种,使得部分中国知识工作者的边疆研究主要围绕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框架展开,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将中国边疆的古今演变转换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史研究。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知识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汇集到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如何将中国边疆研究的一般性思考与域外相关议题的研究加以结合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思考。^①事实上,设若我们将中国边疆研究领域相关理论与方法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域外区域社会体系研究加以结合,则不仅有助于思考更具一般性的边疆议题,或也可能在比较视野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职是之故,本文将尝试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启迪出发对域外地区的边疆——中亚南部绿洲边缘地带的奥什地区加以考察,揭示其“层累地造成的边疆性”(仿顾颉刚语)及其对该边境地区发生的诸多事件之深层影响。

毫无疑问,本文所使用的“层累边疆性”这一概念受到顾颉刚先生中国古史与边疆研究的启发。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说法,认为中国上古史若干叙述是后代伪造与放大的结果,因此应对之进行科学的考辨,追索其在“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断裂与延续。^②顾氏此说在1920年代的学术语境中曾获得不少支持,但在其时以及之后的学术讨论中也一直存有异议。王汎森教授对顾氏此说的思想史做了令人信服的研究,并指出:“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最突出的论点是‘层累造成说’,而且持守之坚至死不渝,他后来的许多重要学术论文都是沿袭这一个方法做成的。”^③1934年,在顾颉刚与其学生史念海共同署名(实为顾氏指导史氏完成)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的变迁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此“检讨(中国)历代疆域之盈亏”的研究路径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得到了实践。^④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顾颉刚先生的“层累”概念与边疆地理的历史研究对本文颇多启发,但笔者并不打算完全以其方案展开具体研究,而仅是在其概念与方法启迪下去分析中亚南部边缘绿洲奥什地区的多重边疆性的叠加状态。

同样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边疆性(Frontier-ness)是指一种区域类型的内在属性,它衍生自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的“过渡地带”理论。在拉铁摩尔的论述中,“过渡地带”是与现代国家边界(Boundary)不同的一种边疆(Frontier)形态;它不是“绝对的地理事实”,而是不同社会与政治体系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广阔边缘地带”;它“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限”,“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⑤进言之,“过渡地带”既指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也指在此空间上所形成的区域社会体系。由此,“层累边疆性”即是指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空结构中的边疆之地理与社会文化空间逐步被压缩或切割,并叠加到某一具体地理与政治空间内部或分散到其外部所形成的古今地理—社会文化因素彼此交缠的边疆样态。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笔者将进入中亚南部的奥什地区,在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地理过程以及发生在该地区的多次事件中去追寻其层累的边疆性。

二、地理—空间与事件

1991年,在苏联原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中亚诞生了五个新国家。在中亚国家建构进程中,位于该区域南部的边缘绿洲奥什因其所上演的多次暴力冲突事件而引起各方的关注,其复杂的地理、边界与族群景观也随之更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如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在讨论奥什地区这些复杂的历史事件之前,笔者将对本文所使用的中亚概念加以说明。相关的概念史研究已经表明,中亚所指涉的范围不仅受近代

① 袁剑:《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与比较可能——基于美国、法国、泰国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② 顾颉刚:《与钱玄同书》,《古史辨自序》(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

③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7年,第29—59页,直接引文出自第30页。

④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⑤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6—157页。

地理知识建构的影响,而且也和其地缘格局的变迁颇多关联^①,这使中亚成为一个难以被定义的区域。目前学界常见的中亚概念有所谓“狭义中亚”与“广义中亚”之说。前者从地缘政治格局出发,用以指涉与今天中亚五国地理范围相当的区域,而后者则以地理和文化要素为依据,所指范围大概是亚欧大陆腹地诸内流河所流经的区域。^②在本文,笔者将在狭义层面的中亚范围内展开相关讨论,但出于论述需要,也将同时关照其更大的时空关联。实际上,正是由于奥什地区深处亚欧大陆的历史与地理结构之中,才使笔者在其新的地缘结构与旧的社会历史—地理空间张力之中发现了其层累的边疆性。

(一) 奥什:地理、经济与族群

奥什(Osh)既是中亚南部边缘地带的绿洲和过渡地带,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作为边缘绿洲,奥什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东南端,并与横穿吉尔吉斯斯坦(以下也称吉国)的天山西脉南坡,以及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西坡交汇,同时成为中亚南部绿洲与北部高山草原的边缘地带。该地区的地貌呈现出荒漠、绿洲和高山草原耦合的景观,坐落在奥什绿洲核心区的苏莱曼山则是中亚南部绿洲远近闻名的“圣山”。奥什境内有数条高山融雪造就的内流河汇入费尔干纳盆地,这将它与该盆地内部诸绿洲城市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奥什绿洲与周围的乌兹根、贾拉拉巴德和纳曼干等小绿洲共同组成了一个次区域绿洲体系,并嵌入到费尔干纳乃至中亚南部的绿洲网络之中。在经济类型上,奥什地区主要有高山草原游牧和绿洲农耕两种经济类型;前者是历史时期从北方草原南下之吉尔吉斯人的主要经济形式,而后者则是中亚南部乌兹别克人以及从中国长城以内农业核心区迁居此地之东干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苏联时期的游牧定居工程中,也有不少吉尔吉斯人从高山草原转到绿洲区定居,并在集体农庄中从事生产活动。苏联解体后,随着部分在近现代移居奥什地区的俄罗斯人与乌克兰人回迁母国以及吉国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展开,部分绿洲农业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定居的吉尔吉斯人和其他相关民族。

作为绿洲城市,奥什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号称吉国南部首都(又或第二都城)。奥什的族群结构多元,但受历史与地理因素影响,仍然形成了以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为主体的格局,除两个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之外,尚有部分人数较少的俄罗斯、土耳其、东干和塔吉克等族群在奥什居住。与位于楚河流域河谷平原,并且作为吉国北方城市代表的首都比什凯克(Bishkek)相比较,奥什虽然在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上屈居吉国第二,但其城市的历史则要悠久得多。据中国吉尔吉斯语言和文化研究专家胡振华先生的研究,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派遣到西域的张骞就曾在向汉武帝报告考察见闻时提到过该城;从汉代到清代,中国传统史书分别以贰什(汉代)、苏对沙那、东曹(隋唐)、倭赤(元代)和鄂什、卧什、鄂斯(明清)等名称对奥什进行过相应的记载^③,其历史之悠久由此可见一斑。在贸易方面,奥什城郊的卡拉苏大巴扎不仅是“吉国”第二大市场,而且也是费尔干纳诸绿洲城市中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奥什在历史时期也是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城市)之一。

很显然,奥什绿洲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中亚南部荒漠—绿洲与北方高山草原的边缘地带,而且在经济类型上也是中亚绿洲农业与草原游牧经济的交错地带。在人群结构方面,它则呈现出定居人群与游牧人群共生杂居的样貌。在奥什地区,农耕与游牧、绿洲城市与草原的地理关系在族群景观上也大致呈现为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的二元对照。作为一个历史古城,奥什还是吉国诸多城市中与北方比什凯克在空间和部落族群关系上具对称性的南方城市。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使得奥什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过渡地带特征的区域社会体系,但在苏联解体后,该社会体系被分割到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三个不同的主权国家之中,并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事件。

① Светлана М. Горшенина. Изобретение концепта Средней /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 наукой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Программа изучен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жорджа Вашингтона www.centralasiaprogram.org, Вашингтон, 2019.

② 李琪:《“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③ 胡振华:《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古城地名“奥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二）事件：过程与结构

众所周知，在苏联的民族划界工程中，奥什地区被划分为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与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交界地带。^①苏联解体后，这种边界与族群犬牙交错的景观在三个独立国家边境的空间结构之中得到了延续，其张力所诱发的族群与边境冲突事件让奥什的“暴力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世界组织（如世界银行）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对中亚展开援助时也特别关注奥什地区的和平构建（Peace-Building）这一议题。^②从苏联解体初期的1990年代到2023年初，奥什地区发生过为数不少的冲突事件，本文将仅选择其中4次较为人知的事件加以分析，分别是：1990年6月的“奥什骚乱”（以下简称“1990年事件”）、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南部革命”（以下简称“2005年事件”）、2010年的“南部骚乱”（以下简称“2010年事件”）与2022年的“塔—吉边境冲突”事件（以下简称“2022年事件”）。

“1990年事件”发生在奥什城和乌兹根的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其诱因是两个族群对一块集体农庄土地使用权的争夺。在事件展开过程中，邻近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部分乌兹别克人曾涌入奥什支援其“同胞”，该次冲突最后在苏联军方介入后才得以平息。^③“2005年事件”发生在以奥什地区为代表的吉国“南方人”（以吉尔吉斯人为主）和以比什凯克为代表的“北方人”（同样以吉尔吉斯人为主）之间。此次事件的诱因是南部吉尔吉斯人不满当年吉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代表“北方人”的阿斯卡·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再次当选——而发起的抗议活动。这次事件最终以阿卡耶夫辞去总统职务而结束，因其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吉国政权“和平演变”的一部分。^④“2010年事件”同样与吉国总统选举中南方和北方的角力有关。在此次事件中，代表吉国南方的总统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被罢免之后，贾拉拉巴德的乌兹别克族与吉尔吉斯族之间发生了小规模暴力冲突，并很快诱发了整个奥什地区的族群冲突。在事件展开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一支小规模武装力量曾进入吉国境内保护其侨民，但不久后撤走，并同时宣布向吉国的乌兹别克侨民开放边界。此次事件在俄罗斯支持的萝扎·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所领导的过渡政府启动国家紧急状态后得到控制。^⑤同前几次事件相比，“2022年事件”是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界冲突中的最新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次事件过程中也伴随有社会层面的族群冲突，但冲突的主体仍然以两国边境的军事力量为主，事件最后也以两国政府之间签署和平协议而告终。^⑥

从1990年至2022年发生在奥什边境的以上事件包含四种不同关系类型的冲突：第一种类型是族际冲突，它们主要发生在吉国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与非主体民族乌兹别克人之间，属于此类关系结构下的冲突是“1990事件”和“2010事件”。第二种类型是吉国部落—地区主义之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吉国南方奥什的吉尔吉斯人与北方吉尔吉斯人之间，两者在部落结构上是左翼和右翼的关系，双方的冲突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选举过程或具体结果有一定关联性（总统的部落或地区代表性），属于此类冲突的事件是“2005年事件”与“2010年事件”。第三种类型是奥什地区定居绿洲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冲突，此类冲突有一定的生态文化与族群特征，具体表现为定居的乌兹别克人与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冲突。属于此类关系结构的事件有“1990事件”“2005年事件”与“2010事件”；在此关系结构中，虽然冲突中有不少吉尔吉斯人已然定居，但在生态社会文化结构中，其游牧定居较之于乌兹别克人的绿洲农业定

① 关于苏联的中亚民族划界工作，见施越：《“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Bichsel, C.(2009).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Irrigation disputes in the Ferghana Valley*, New York: Routledge, p.2

③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A5%A7%E4%BB%80%E9%A8%B7%E4%BA%82>,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

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81%E9%87%91%E9%A6%99%E9%9D%A9%E5%91%BD>,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

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E5%90%89%E5%B0%94%E5%90%89%E6%96%AF%E6%96%AF%E5%9D%A6%E5%8D%97%E9%83%A8%E7%A7%8D%E6%97%8F%E9%AA%9A%E4%B9%B1>,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

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5%90%89%E7%88%BE%E5%90%89%E6%96%AF%E2%80%94%E5%A1%94%E5%90%89%E5%85%8B%E9%82%8A%E5%A2%83%E8%A1%9D%E7%AA%81>, 访问时间：2023年5月20日。

居形式深度显然不够,因而这些群体在冲突中往往表现出中立的态度。第四种类型是边界事件,属于国际关系层面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属于此类型的是“2020年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出现在第二种与第三种冲突关系中的“2005年事件”虽有其深层结构,但其在表层结构中率属“颜色革命”的事实说明,在吉国独立之后,国际关系因素已经卷入到了其国内部落—地区主义与社会形态冲突的关系结构之中;或者说域外国家似乎也在利用吉国内部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影响其社会与政治秩序。

不难看出,在上文所罗列的四次冲突事件中,仅有“2022年事件”的行动主体清晰体现为主权国家,其余三次事件冲突则以社会力量或族群为主要角色。与此同时,几次事件也都具有其复杂性。首先,“1990事件”与“2010事件”的结构关系在表层是国家建构过程中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族际冲突,但其深层结构则是社会—地理层面的游牧与定居二元关系。其次,“2022年事件”中,国家间的边界冲突在表层结构上看起来和“2005年事件”与“2010事件”中国家内部的部落—地区主义冲突呈现为不同类型,但三者又都同时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地理的历史结构关系——新国家与旧边疆的二元关系。再次,若对奥什绿洲层累叠加的边疆性加以追踪,则将会看到在新国家与旧边疆之间社会—地理的古今结构背后仍然潜藏着更为深层的边疆结构。这一结构即是历史上被压缩到奥什绿洲地带之中亚区域内部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与七河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部),即绿洲农业区与草原游牧区的南北二元关系。设若在这一深层结构的基础上来观察前述事件,则四种冲突类型中的关系结构所呈现的差异都显得过于表面,所有冲突背后的二元结构都清晰地体现为中亚当代国家建构与其历史边疆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换言之,当从层累的边疆性考察奥什边境诸事件之时不难发现,虽然前述四种类型的关系结构体现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构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间的边界冲突以及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它们也都难免受到奥什地区古今两种边疆类型的二元关系结构的支配或牵引。

三、从层累的边疆性重观奥什边境诸事件

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南部奥什这一边缘绿洲所发生的若干冲突事件自其发生伊始就备受中外学界关注,不少学者从民族冲突、部落主义、精英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层面对之进行了讨论。从民族视域进行的研究多聚焦历次事件中不同族群之间冲突,并将其归因为由族性(Ethnicity)与认同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但有学者已经指出,这种解释路径具有明显的本质主义取向。^①正如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的研究表明的那样,族性本身具有流动性,奥什事件中诸族群间的暴力冲突并非完全由民族差异所导致,更多的是社会文化、心理与谣言等综合影响的结果。^②从部落因素分析奥什事件中南方与北方结构性冲突的学者则将之归结为吉国非正式社会力量对其制度性政治过程的渗透。^③以精英政治作为关切点所展开的研究则认为吉国政治精英的分裂以及在动员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时目的不一致是造成国家与地方秩序混乱的原因。^④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对奥什地区边界冲突所做的研究则多从苏联民族划界的遗产、跨国资源利用纠纷、边境军事化以及诸多争端缺乏有效解决机制等因素去分析以国家主体为行动者的冲突事件。^⑤此外,有学者从“转型国家”角度对吉国内部南北冲突与国际关系之间内外交织的基本特征做了分析。^⑥很显然,从以上几种路径对奥什诸冲突事件所进行的讨论都准确触及了与之相关的面向,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遗留了未被解释的其他面向。

与此同时,从以上诸领域学者对奥什冲突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论述路径不同,但论者均无一

① Megoran, N.(2007). On Researching "Ethnic Conflict": Epistemology, Politics, and a Central Asian Boundary Dispute. *Europe-Asia Studies*, 59(2), 253-277.

② Tishkov, V.(1995). "Don't Kill Me, I'm a Kyrgyz!":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Violence in the Osh Ethn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2(2), 133-149.

③ Collins, K.(2004).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56(2), 224-261.

④ McGlinchey, E.(2011). Exploring Regime Instability and Ethnic Violence in Kyrgyzstan, *Asia Policy*, 12, 79-98.

⑤ Toktomushev, K.(2018). Understanding Cross-Border Conflict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Connections*, 17(1), 21-41.

⑥ 石晨叶、管涛:《失序的吉尔吉斯——内部撕裂与大国较量中的新国家》,《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

例外指向了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构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相应问题。就此而言，梅戈兰（Nick Megoran）从政治地理学路径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界生成之研究^①，以及侯艾君用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从中亚现代化与现代国家建构关系对“1990年事件”和“2010年事件”所进行的讨论^②都值得重视。梅戈兰认为，国际边界的诞生更多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非仅由国家划界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奥什边界有其从苏联时期延续到后苏联时期的生命史。侯氏则注意到，苏联所开启的中亚现代化与后苏联时期该地区民族国家进程之间的矛盾是影响奥什族际冲突的内在因素。毫无疑问，采取较长时段分析框架的梅戈兰与侯氏都揭示了奥什诸冲突事件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但稍有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均未触及作为边缘绿洲的奥什背后潜藏之社会—地理空间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国家空间社会过程两种有着实质性差异的空间结构张力对诸多事件的影响。质言之，前述两位研究者所讨论的仍是现代国家建构之短时段问题，因此其对奥什诸事件中各类冲突的解释也难免存有剩余物。显然，从奥什地区层累的边疆性去观察旧边疆与新国家在空间层面的古今矛盾及其对当代中亚国家建构的影响需要采取更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框架。

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作为边缘地带的奥什与中亚南部荒漠—绿洲农业核心区河中地区和北部草原游牧部落政权长期活跃的七河地区均有其社会—地理的历史性关联。对中亚南部的荒漠—绿洲社会体系而言，奥什地区显然是其社会经济体系进入北方草原所能抵达的社会—地理限度。相应的，当北方草原诸游牧部落南下时（设若他们想要继续保持游牧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奥什地区也将成为其“以北治南”的边缘地带。质言之，奥什绿洲的社会—地理空间早已嵌入到了中亚南部绿洲农业区与北方草原游牧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与区域社会体系结构之中。除此之外，若从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去观察，作为中亚内部诸区域社会体系过渡地带之一的奥什—费尔干纳绿洲社会也嵌入到了河中地区和西部伊朗高原诸社会体系之间的社会—地理之历史关系结构中。^③与此同时，它也随之成为中亚七河地区与其北方（或西部）草原之间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结构的历史地理组件。^④因此之故，奥什地区的社会—地理及其区域社会体系也随之被历史上牵动亚欧大陆进程的中亚南北关系结构传导到更大的世界秩序内部，并成为其结构意义上的过渡地带之一。

然而，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俄罗斯帝国的东向拓殖^⑤，中亚区域社会政治体系中的南北关系结构所能牵动的历史地理空间逐步被压缩，亚欧腹地的社会—地理的历史结构也发生了移动和性质上的转变。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随着沙俄帝国东进步伐的持续展开，中亚北部草原与南部绿洲地区逐步被纳入其帝国疆域。与之伴随的是，在英印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中亚“大博弈”（Big Game）进程里^⑥，中亚过渡地带则转移到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的中亚荒漠—绿洲区域。在拉铁摩尔看来，此地带成为18—19世纪英印帝国北上中亚进行商业投资与政治活动的北部边疆（社会—地理限度）；在这些地区“发展英国实业，只会脱离印度帝国中心，对于中心帝国，它们没有多少贡献。无论是帝国政治发展还是经济发展，西北边疆都标志着利益减退的限度”^⑦。因此之故，中亚南部绿洲与阿富汗北部交汇地带在成为英俄两帝国边疆的同时，也成为能够挑战其帝国中心的过渡地带（区域社会体系）。

事实上，随着中亚过渡地带的转移，该地区的历史结构也发生了根本转型，亚欧大陆的历史进程逐步被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二元关系结构所支配，中亚也在此新的历史结构中开启了所谓的“近代”。与此同时，在中亚绝大部分区域成为俄罗斯帝国边疆区的过程中，其社会历史—地理的边疆性质也转型

① Megoran, N.(2012).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 Biography of the Kyrgyzstan Uzbekistan Bounda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2(2), 464-481.

② 侯艾君：《奥什事件：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族际冲突探析》，《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

③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之前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4页。

④ 关于七河地区作为中亚游牧力量的“中心地”的相关论述，见[俄]巴透尔德，《七河史》，赵偏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⑤ [俄]M. A. 捷联季耶夫：《征服中亚史》（一），武汉大学外文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页。

⑥ 参见[英]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

⑦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为帝国中心与边缘（圣彼得堡与中亚）的权力空间结构。15世纪之前曾经深刻影响亚欧大陆社会与历史进程的中亚南北关系结构逐步被压缩到奥什这一具有过渡地带性质的地理空间与区域社会体系中，并使之成为边疆中的“边疆”。即便如此，18世纪中后期，在费尔干纳—奥什边缘绿洲地区所形成的以半农半牧经济类型作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体系（浩汗国）也曾经一度影响了中亚及其周边的区域秩序。^①但这或许也是中亚南北关系结构在社会—地理的历史关系层面的最后一次展开，在此之后，费尔干纳—奥什—西天山南坡这一地理连续带更多作为近代中亚区域内部的过渡地带而存在。虽然它对中亚内部秩序的挑战依然存在，但其能量似乎不足以传导到亚欧大陆秩序建构的历史过程中。随着中亚地区作为俄罗斯帝国边疆区（以及其后苏联边疆区）的中心—边缘空间权力结构的进一步定型，奥什地区的过渡地带性质之传导也从社会历史的地理展开转换为历史（事件）的时间堆叠。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揭示出了奥什边境诸多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层累的边疆性及其彼此间的结构性张力。作为历史上中亚南北关系结构中重要的社会—地理历史空间的组成部分，奥什地区在近代中亚过渡地带的地理位置转移及其性质改变的过程中逐步成为“狭义中亚”区域内部的过渡地带。由于历史上牵动亚欧大陆社会历史进程的边疆结构被压缩到其地理与社会空间内部，奥什地区也随之成为“边疆”中的边疆。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认为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是中亚国家建构的观念与制度基础，即便那些将当代中亚国家视为一种全新的发明者也不例外。^②因此，现代中亚的“有界边疆”始于1924年苏联的中亚民族划界，在此之前，奥什地区并无国家意义上的边界。^③从中亚当前的国家建构与边界格局来看，这些观点显然并无不妥，但设若对奥什地区飞地、边界与族群犬牙交错的边境景观加以留意，则似乎也可以认为苏联的民族划界工作并未彻底消化掉在该地区逐层叠加的历史边疆结构。与之相反，民族划界只不过是旧边疆的地理空间上再次叠加了另一种新的边疆形态。1991年之后，随着苏联在中心与边缘（莫斯科与中亚）的边疆结构中为当地所提供之权力秩序的消逝，潜藏在新边疆（Boundarys）之下的旧边疆（Frontier）以新样式出现在中亚国家建构的社会—政治过程之中。堆叠在这些新国家边境空间之下的旧边疆不再以社会—历史的地理展开为其轨迹，而是在现代国家空间范畴下以边境（历史）事件的样貌呈现出来；在这些事件沿着时间线展开的过程中，层累的边疆性也随之导入了国家建构与社会治理的日程之中。

四、结 论

在过去的研究中，1991年以来奥什边境地区的诸多冲突事件要么被归类到现代国家建构所衍生的当代问题之中，要么被视为苏联遗产的历史延续。虽然这些解释都触及了奥什地区边境事件中的社会与政治关系，但同时却将更为深层的社会—地理与不同时空范畴之间的结构关系从中过滤了出去。本文借助顾颉刚先生的中国古史与历史地理研究之概念和方法论启发，综合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理论，从长时段历史人类学路径对奥什绿洲当代边境（Borderlands）冲突事件背后的社会—地理之历史结构进行挖掘，揭示了其层累的边疆性特质。从奥什边境地区逐层叠加的边疆形态可以看出，中亚国家的“短期诞生”之后有一个长期的社会—地理结构关系的空间位移、压缩与潜沉的区域历史进程。奥什诸事件是累积在边境地理上的新国家与旧边疆两种不同性质的时空结构彼此间张力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之呈现。边境诸事件中的社会、族群与国际关系等类型的冲突更多是中亚国家建构中的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中亚区域社会—地理的历史边疆性与现代国家边界的时空叠加。这两个时空结构的古今关系及其在当代社会政治过程中的展开随之衍生为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诸冲突事件中的二元关系结构。

① 参见蓝琪：《中亚史》（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9页；潘志平：《中亚浩汗国与清代新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Roy, O.(2000).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161.

③ Megoran, N.(2012).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 Biography of the Kyrgyzstan Uzbekistan Bounda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2(2), 469.

总而言之，本文所进行的探索性研究及其发现提示着在中国自身的（边疆研究）学术传统中寻找理论资源，对其加以创造性转换之后展开域外相应议题的研究似乎是可行的。事实上，在亚欧大陆诸多国家中，社会—地理的历史边疆在主权国家空间之内（或之内）的层累叠加似乎有其一般性。在这些边疆类型的时间性关系中开展“考古工作”，对观察相应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结构及其转型颇多助益。两年前，笔者在考察河西走廊的边疆性时曾发现了类似奥什地区的空间关系，但不同的是，该地域不仅在秦汉时代即作为中国多元一体关系结构的社会—地理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整体历史结构持续展开的过程中成为架构大一统疆域结构的核心地带；因此，在其近代边疆性的再生产过程中，它的轨迹乃是在文化想象的层面展开^①，而没有类似于奥什地区的社会政治过程以及诸类型的二元冲突关系。此外，本文的探索性研究还表明，将边疆视为一种区域社会体系进行研究是可能的。在中国当前的学术语境中，探寻边疆研究与域外研究在学术层面的一般性议题，并以之开展域外国家的边疆研究不仅能拓展和丰富中国的边疆与区域国别研究，或也可在理论与经验层面对比较边疆研究做些许准备工作。（文章的修改参考了匿名评审人的建议，谨致谢忱。）

Old Frontiers in a New State: Cascading Frontierness and Border Events in Osh, a Marginal Oasis in Southern Central Asia

LI Ru-dong

(Shanghai Academy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rea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Since 1991, numerous conflicts in the Osh region, a marginal oasis in the south of Central Asia,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shifting location, spatial compression and temporal layering of the socio-geographical-historical structure of the region in Central Asia. Cascading frontierness cannot only serve as an explanation of the deep structure of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ethnic conflicts along borders in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sian state-building, but also a general phenomen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s in the Eurasian continent.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rontierness ma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issues on frontier studies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 study regarding various types of regional social systems.

Keywords: Central Asia, Events, Cascading Frontierness, Osh, State-building

[责任编辑：赵蔚平]

^① 李如东：《纳“旧疆”入现代：20世纪三十四时年代开发河西走廊诸论述中的边疆话语》，《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